

信息公开岂能像“挤牙膏”

□ 纪玉

民以食为天，大米更是国人的主食之一，什么都能不吃，却不能不吃飯。要是大米的质量出现问题，公众当然会非常关心，也会急于想知道详细信息。因此，如果政府部门在相关信息的公开上像“挤牙膏”般吞吞吐吐，自然会引来质疑。

5月16日，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布第一季度的餐饮环节抽检数据，在抽检的18批次米及米制品中，有8批次产品镉超标，但是未公布不合格产品的具体信息。17日晚，公布不合格产品的4家使用单位及镉含量。又经历了一天的舆论追问后，18日晚，终于公布不合格产品的品牌和生产厂家，但是产品流向和查获数量仍未公开。另外，除了米及米制品，还有6类产品被检出不合格情况，但未公布具体信息。

每一次信息公开，都要拖一个“但是”；在舆论推动下，才一点一点如“挤牙膏”般透露出不合格产品的具体信息；这样的信息公开，既不符合法律规定，也不能让公众满意。

《食品安全法》规定，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公布信息，应当做到准确、及时、客观。《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进一步规定，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同时对有关食品可能产生的危害进行解释、说明。《食品安全信息公开管理办法》也明确了有关部门的责任，要求不得隐瞒、谎报、缓报。只公布

食品抽检的大概情况，却不公布具体信息，显然有违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定义务。

何况，连不合格产品的品牌都要隐瞒，这样的检测结果对公众来说有什么意义呢？公众真正需要的信息，是要指明哪种食品合格，哪种不合格，这样购买时才有依据，才能放心。不然，只公布抽检产品中有百分之几合格，难道要公众用健康去赌那百分之几的概率吗？不要说这次米及米制品检测合格率刚过50%，就算合格率超过90%的产品，不透露具体信息，公众也难免“心慌慌”，还可能为了避免风险，选择不购买此类产品。如此，合格产品得不到肯定，反而要为不合格产品承担声誉和经济上的风险，不合格产品却能躲在暗处窃喜。

食品安全信息越透明，才越能减少恐慌。无论从保护公众健康，还是从保护市场秩序的角度出发，信息公开遮遮掩掩的危害显而易见，还会损害政府公信力，令公众质疑有关部门隐瞒信息的原因。唯一受到“保护”的，竟是不合格产品。然而，尽管有这样多的危害，类似的信息公开，却不是个别。及时回应舆论追问，能督促有关部门更好地维护公共利益，但只靠舆论“抓漏”，并不能保证信息公开质量的稳定性。信息公开要公开到实处，要保证公开公众真正需要的信息，就必须明确规定必须公开的内容，明确责任归属。以制度保障并严格执行，这样的市场守望者，才能让公众安心。

一份“休闲报告”所引发的借题发挥

□ 蒋璟璟

5月19日，国家旅游局首次发布《中国国民休闲状况调查报告》。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中国国民倾向于对自己的休闲生活抱有负面评价，认为休闲是吃喝玩乐，会阻碍个人和社会发展；从主观上来看，中国国民旅游休闲的愿望还不够强烈。

一份针对国民休闲状况的全方位报告，注定能有很多种解读路径。有人注意到了“工作日空闲时间”之短，继而又心生灰暗落寞之感；也有人揪出“国人旅游休闲意愿不强”的只言片语，乃至愤怒驳斥、大加鞭撻……就这样，一个原本高度专业化的调查文本，却并未被公众严谨看待，反倒不幸沦为围观者吐槽休假权沦陷的载体而已。

《中国国民休闲状况调查报告》的意义，自然不在于提示国人休假权堪忧、消费能力仍弱。事实上，该报告的独特性，恰在于引出了某些颇为新颖的议题。比如，“国人倾向对自己的休闲抱有负面评价”，之于此类结论，

该当如何理解？

在今天这个消费时代，国人竟还对休闲活动心怀忐忑？然而联想到国民文化中，一贯存在的禁欲主义倾向，一切似乎又变得合情合理了。须知，在此间的伦理判断中，个体的感官享受，历来被归类为消磨意志的负面事物。

国人旅游休闲愿望不强烈，最理所当然的原因，当然是无钱、无闲。但诚如《中国国民休闲状况调查报告》所提出的，未尝没有一些更隐秘的心理因素，在深刻影响着你的休闲习惯。

倘若有钱有闲了，中国国民就会将旅游作为优先的休闲选择吗？想来未必！从本质上说，金钱、假期的多少，与旅行意愿的强烈程度，并不必然呈正相关关系……真正重要的是，找到适合自己的休闲模式，其既要有实现条件，又应不悖逆国民道德观。当然与此同时，呼吁提高收入、增加休假时间，也是可以理解且务必坚持的诉求表达。

官方数据不该是块橡皮泥

□ 刘海明

在民政部此前公布的统计数据中，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接收的芦山地震救灾款物，比红会自己公布的数字少了46万元。5月19日，民政部就此发布更正声明称，统计数据中关于红会的数据本应截至5月9日，发布时却写成了5月10日，以致最终统计数据与红会的统计数据不一致。

官方网站数据出现偏差，并非头一遭。地震震级，国内外发布的级别有别，相关部门解释说出口评定的标准有别；同一时期中国产品进出口数据，国内外官方数据相差明显，相关部门会告诉公众，统计的方法不同。这样的解释多了，人们不免要问：官方发布数据，讲究权威性，既然和国际接轨的口号喊了多年，咱们发布的数据能不能采用国际惯例？

数据是客观的，能够精确也应该精确，不该有闪失。倘若国家部委发布的权威数据，总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出现差错，然后又告诉公众“弄错了”，如此反复必然会影



“不买警服就关门”吓退多少创业者

□ 文/尔冬 图/朱慧卿

警衔、肩章、警徽一应俱全；颜色、面料、外观和制式警服一模一样，甚至胸前还有统一编制的“警号”。最近，西安市雁塔区罗家寨村和郝家新村开旅馆的老板们都被要求定制这样的一身“警服”，而提出这一要求的是负责该辖区治安的小寨路派出所。“不买就让关门”，商户对此很无奈。

常听生意人抱怨“你们不知道，做生意真难”，很多时候有点“只看贼吃肉，不见贼挨打”的意思。看了这事发现，做生意，还真是难。

你想，一个派出所的副所长就能让旅馆关门，面对着各种“管理者”的小生意人，风险有多大？有几天好日子过？

警服摊派到了极致，就像“定制警服”这事情，就让人感到有些搞笑。但我们很难笑得出来——假如地方的投资创业环境到了这种地步，谁还敢创业？谁还敢投资？谁还敢干点实事？

今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将达699万人，比2012年增加19万人。但从就业工作的重点指标——应届毕业生的签约率来看，其与去年同比均呈现下降趋势。经济形势、应届生的求职观念和高校专业结构的设置对此均有影响。

看到做生意可能会面临如此艰难的环境，我们也就明白，为啥大学生们没有信心投入到实体经济中去创业、就业，而是拼死也要进机关事业单位和垄断国企了。

“语文学不学无所谓”症结在哪里

□ 温儒敏

高考临近，高考语文教育问题又成为了舆论关注的热点。这跟语文学科所具有的特性有关——语文是综合性学科，涉及面广，社会性强，和国人的生活密切相关，大家都插得上嘴，而数理化就往往让人“难开尊口”。

当前在高考指挥下的语文教育确实存在种种问题，如急功近利搞“提前量”，教学失去“梯度”，不让学生读“闲书”等等。在众多问题中，笔者认为首先要改变高考作文阅卷“趋中率”严重的问题。高考语文总150分，作文占60分，评分4个等级，其中二等40分上下。据北京、福建等省市调查，近四年来，二等卷占75%~80%，一等占8%~10%，35分以下的三、四等不到20%。“趋中率”畸高，很难高分，而马虎应对就40分上下，这也导致语文学不学无所谓的风气。

笔者认为，只要拉开分差，把趋中的“大肚子”缩小，增加高分比重，那就能抑制语文学不学都无所谓的想法，提高语文学习的积极性。当然，还有高考和中考的命题等方面也要改革，抑制“套式作文”和“文艺腔”，抑制读死书和题海战术现象。这个“指挥棒”其实是可以朝着正面去指挥的。

社会学专家郑也夫曾撰文指出当下的语文考试，50%以上考的是“伪语文”“伪能力”，呼吁“重回以作文为中心的语文考试”，这个观点有点夸大。如果语文考试只考作文与阅读，作文占70%，阅读占30%，恐怕不行。语文不只是文学，还包括必要的语言

文化知识，作文和阅读不可能完全取代对知识结构的考查。再说这是选拔性考试，不同于一般的评价性考试，命题总是要有合适的区分度和难度系数的，否则很难操作。差一分可能就涉及千百个考生的命运，而作文评分又难于做到非常精确，所以如果让作文占分过大，可能会制造更多的不公平。但如果作文分增加到总分的一半，则可以试试，关键是阅卷也要科学地跟进，不能再像现在这样普遍地存在学不学都是“二等分”的现象。

这些年高考语文命题有了一些改进，但现在高考是全国卷与许多省市的卷子并存，有些良莠不齐。如何提高命题水平？现在有些省市的高考（中考）命题队伍受各种条件限制，比如命题因为保密，要较长期封闭工作，真正有水平的专家不愿意参与；行政干预过多等等。这就很难保证命题的水平与质量。笔者认为高考还是全国集中命题比较稳妥。要从政策上鼓励专业人士去研究、参与高考的改革，加大高考改革力度，力求提高高考改革成效，不让“散兵游勇”在媒体上重复批评高考。

高考改革可能有四个去向：一是中学只负责学业水平考试，让高考社会化；二是继续拓展和完善高校自主招生制度；三是开放政府之外的第三方独立的教育考试评价机构，为高校和用人单位服务；四是高考适度改进，提升命题和阅卷的专业水平与质量，发挥正面“指挥”作用。现在，喊喊口号或者写些痛快文章容易，要改革就难得多，在教育领域哪怕是一寸的改革，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